

བོད་མཁའ་ལྷན་པུན་པོ་ལྷན་པུན་པོ་

西藏文物考古研究

ཐེན་པུན་པོ་

(第1辑)

བོད་མཁའ་ལྷན་པུན་པོ་ལྷན་པུན་པོ་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编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西藏文物考古与古建筑为主要讨论对象,文章类型包括考古调查简报、专题研究、综述、建筑勘察报告、修缮方案等。本书收录文章所讨论的时间上限至前吐蕃王朝(约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7世纪)时期,下限到民国时期;内容涉及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古遗址、古墓葬、石刻造像、古建筑、文化线路等的研究成果。本书的出版目的在于为广大读者提供较为集中的有关西藏文物考古、古建筑及其修缮报告等方面的信息与研究成果。

本书适用于文物、考古、古建筑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藏文物考古研究.第1辑/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03-040612-5

I. ①西… II. ①西… III. ①文物-考古-西藏 IV. ①K872. 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7439号

责任编辑:宋小军 赵 越/责任校对:刘亚琦

责任印制:赵德静/封面设计:北京美光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4年5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4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5 插页:14

字数:500 000

定价:18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西藏文物考古研究》 编辑委员会

总 编：桑 布

副总编：丹增朗杰 哈比布

编 委：李林辉 张纪平 夏格旺堆 陈祖军
边巴顿珠 格桑央金 罗布扎西

主 编：哈比布

副主编：李林辉 张纪平

前 言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于2005年成立，负责承担全区境内地上地下文物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古建筑维修与勘察设计研究工作，出土文物、馆藏文物及部分不可移动文物的科技保护工作。内设考古研究室、文物保护研究室、行政办公室，并正在筹备科技保护实验室。

2007年，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先后获得国家文物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资质证书》《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乙级资质证书》，成为全区文物系统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拥有考古、文物保护两大业务领域资质的单位。目前，全所在岗正式干部职工16人，其中业务人员11人：研究馆员1名，副研究馆员2名，文博馆员3名，助理馆员4名，专业技术人员占总人数的67%。

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成立以来，在文物普查、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古建筑保护方案设计等方面都取得一些重要成果。

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突出成绩

2007年至2011年，以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业务人员为主组成的西藏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办公室技术指导、督导组出色地完成全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培训、试点工作后，又赴全区七个地市进行授课、现场实习及技术指导、督导等工作，为顺利完成第二阶段普查工作提供了技术保证。在最后进行的各地区市普查资料整理、汇总工作阶段中，更是得到技术指导、督导组专家的全面悉心指导、认真修改与严格把关，最终形成西藏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电子数据档案资料。2010年9月9日至19日，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专家对西藏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电子数据及实地文物调查阶段工作进行了资料查验和实地调查，经过考察、复核，验收专家组一致同意西藏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工作通过国家验收组的整体验收。经过最后核定，自治区不可移动文物点调查对象总量为4294处，登记对象总量为4277处，其中，复查1264处，新发现3013处，消失17处。其中，有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参与进行的唐加寺、洛哇傍卡摩崖造像、墨脱县石器地点、华贡山摩崖题刻、恰姆石窟等一系列调查与研究均取得了重要成果。

在对墨竹工卡县唐加寺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并确认了该寺卓玛拉康殿外墙上保存的早期壁画，经过反复考证，确认壁画时代不晚于11世纪，为研究卫藏地区早期佛教历

史与艺术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在对工布江达县洛哇傍卡摩崖造像进行的调查中发现了具有吐蕃时期藏文特征的题刻、造像、线刻佛塔等。这是目前在林芝地区境内发现的最早的摩崖造像遗存,其年代极有可能早至9世纪的吐蕃王朝时期,至迟当在10世纪,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在墨脱县境内进行文物普查工作中,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与林芝地区的文物工作者在雅鲁藏布江两岸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地点,使该县境内的磨制石器地点数量增加至17处之多,为研究该区域的古代文化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业务人员在对照察隅县文物普查资料进行审核时,对该县新发现的文物点——华贡山摩崖题刻进行了细致研究,廓清了与该石刻有关的历史背景与脉络,通过考证,撰写了《从察隅县华贡山摩崖题刻谈中国中央政府对察隅地区的开发与治理》一文,结合史料对清末民初中国中央政府对藏南下察隅地区的开发与治理的历史事实进行梳理,无可辩驳地论证了我国对藏南下察隅地区有着无可争议的主权。

对西藏自治区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的重要发现——恰姆石窟进行的一系列后续研究表明,该石窟的早期泥塑、壁画的年代至迟当在11世纪,其开窟年代不排除早至9~10世纪的可能性。恰姆石窟是目前所知日喀则地区境内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一座石窟群,也是继岗巴县乃甲切木石窟、拉孜石窟后日喀则地区境内发现的最重要的一座石窟,为研究西藏早期佛教历史与艺术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二、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获得重要成果

1. 配合文物保护维修工程进行的考古工作

六年来,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积极配合“西藏三大重点文物保护维修工程”“西藏十一五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和“西藏自治区十二五文物保护维修工程”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为西藏自治区的重点文物保护维修工程顺利进行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技术保障。

2005年7月至2007年8月,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博物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位于日喀则地区萨迦县境内的萨迦寺开展了为期3个年度的配合萨迦寺维修工程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其中前两个年度历时7个月,以调查与发掘为重点,对萨迦北寺得确颇章、古绒、乌孜宁玛大殿、南寺羊马城墙及护城河等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6126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1000余件。对萨迦寺进行的考古调查与清理,使我们对其主要建筑的历史沿革、建筑技艺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调查中发现的佛教壁画和考古清理出土的铜像、擦擦、泥塑遗物显示出以萨迦寺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后藏上部地区佛教艺术较西藏其他地方的佛教艺术有着较为独特的特征。

在林芝地区工布江达县太昭古城遗址文物保护工程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中,不仅清理了残存的关帝庙建筑遗址,还对周边的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存进行了调查与考证,在周边发现数处摩崖石刻与造像,并在对洛哇傍卡摩崖造像进行调查中发现了吐蕃时期藏文题刻、线刻佛塔与造像等,确认了太昭古城内清嘉庆二年的汉文石碑为修路纪功碑。

对日喀则地区亚东县清朝亚东海关遗址进行的发掘基本搞清了海关建筑群的布局及各单体建筑的功能,与此同时,在海关遗址周边进行的调查中发现了与亚东海关有关的关墙与哨所遗址、马厰遗址、英商代理处遗址等一大批建筑遗存,将亚东海关遗址的分布范围由原来认知的4000平方米扩大至约6.5万平方米。

配合吉隆县宗嘎曲德寺-卓玛拉康文物保护工程进行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不仅确认了宗嘎曲德寺扎西果芒殿、康巴嘎如殿等殿堂的早期建筑布局及其后期改扩建情况,并且对贡塘王城遗址及其周边遗存进行的调查等工作作为制订宗嘎曲德寺维修保护设计方案提供了科学依据。

山南地区加查县达拉岗布寺文物保护维修工程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基本搞清了达拉岗布寺曲康萨玛大殿的结构布局,亦对寺院建筑群的整体布局与历史沿革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为达拉岗布寺应急抢险维修工程方案的编制提供了科学、翔实的实证。同时,丰富的遗迹与遗物,为诠释西藏寺院建筑结构尤其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寺院建筑布局、结构的时代特征,以及藏传佛教文化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更加全面地了解达拉岗布寺的历史、文化面貌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阿里地区札达县古格故城遗址洞窟考古调查是为配合洞窟边坡加固工程而进行的。共调查各种洞窟717孔,对需要进行重点加固和维护的洞窟进行仔细调查,基本摸清了这些洞窟的现状,为洞窟边坡加固保护工程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2. 配合基本建设进行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

为使西藏自治区的基本建设得以顺利进行,自2006年起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陆续开展了澜沧江古水水电站、扎雪水电站、拉洛水利枢纽工程、旁多水利枢纽工程、多布水电站、藏木水电站、西藏中部电网220kV输变电工程变电站、果多水电站、青海—西藏±400kV直流联网及其接地极线路工程朗塘换流站、西藏阿里地区并网10MWp光伏电站、仁多水库、侧格电站、尼木县桑阿颇章曲登、曲水县玉杰宗取水暗道遗址等考古调查、发掘和项目评估工作。

与此同时,对在农田基本建设和扶贫项目建设中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存进行的考古调查、试掘等工作也取得重要收获。如拉萨市曲水县哈鲁囊遗址考古调查、林芝地区波密县拉颇遗址考古调查与试掘等,分别在藏中的拉萨河流域和藏东的波得藏布流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填补了西藏自治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分布的时空空白,为建立西藏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3. 专题文物考古调查

2006年,西藏自治区文研所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专家对芒康县纳西乡扎古西石刻造像及邦达乡的郎巴郎则拉康佛教造像和石刻进行专题调查,初步确认这些造像和石刻的时代为吐蕃王朝时期的遗存,进一步表明在连系川、滇、藏的茶马古道上有着深厚的历史与文化积淀,为吐蕃王朝的兴盛与衰亡、藏传佛教的兴起与传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2009年7月,西藏自治区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合作开展的藏东吐蕃时期石刻专项调查中,对分布于芒康、察雅两县境内的7处吐蕃王朝时期石刻及摩崖造像开展了详细调查与考古记录工作,此次专项调查梳理了藏东保存的吐蕃时期石刻,对其中的6处地点摩崖及石刻做了详细的文字、照片、绘图或拓片记录,为迄今开展的工作中最全面的一次。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对已知的摩崖及石刻地点开展的工作外,此次调查中新发现达琼摩崖造像、然堆村且马龙石刻地点18件吐蕃王朝时期的石刻作品。此次在芒康县境内发现确认的18件吐蕃王朝时期石刻为西藏乃至国内考古的重大发现,这批石刻及摩崖造像,不仅充实了西藏地区早期石刻造像的实物资料,而且为西藏古代佛教造像、唐蕃古道各类文化遗存等方面的研究寻找到具有科学意义的重要依据。

2008年,日喀则地区文物普查队首次对定结县的恰姆石窟进行了专业调查。2011年8月,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与中国藏学中心合作对恰姆石窟进行了专题调查,确认恰姆石窟是一座规模较为庞大的石窟群,确定了恰姆石窟群I区内三个重要窟的形制、结构,以及窟内泥塑、壁画的大致题材。经过 ^{14}C 测年、图像风格特征比较,恰姆石窟早期泥塑、壁画的年代至迟当在11世纪,其开窟年代不排除早至9~10世纪的可能性。恰姆石窟的发现,扩大了西藏乃至中国石窟的分布空间,尤其是I区三个重要窟内存留的泥塑、壁画之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对探讨西藏早期佛教艺术、佛教发展史,甚至后弘期初期西藏社会历史的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恰姆石窟以雕塑形式供奉金刚界曼荼罗的做法,为探讨金刚界曼荼罗在西藏境内的传播、藏传密教思想的发展等问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文物保护工作成果丰硕

按照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的安排部署,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组织人员在全面调研的基础上编制完成《西藏自治区“十一五”文物保护事业规划》《西藏自治区“十一五”文物保护事业项目规划》《西藏自治区“十二五”文物保护事业规划》《西藏自治区“十二五”文物保护事业项目专项规划》《西藏自治区“十二五”革命文物事业保护专项规划》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工作。

建所至今,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文物保护研究室正式在编人员长期仅有两三

个人，他们在任务重、人员少、时间紧的情况下已经独立完成30余处文物保护单位的现场勘测和保护维修方案的编制，与相关部门合作完成保护维修方案和可行性研究报告11篇，同时还协助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完成多处文物保护单位的设计审查工作和自治区城镇规划的评审。

取得的主要成果有：《西藏江孜县帕拉庄园勘察报告及修缮设计方案》《林周县吉拉康寺陈列室的设计方案》《日喀则亚东清代海关遗址保护维修工程设计方案及可行性研究报告》《亚东东嘎寺保护维修工程设计方案及可行性研究报告》《林芝太昭古城的保护维修工程设计方案及可行性研究报告》《日喀则康马县艾旺寺的保护维修工程设计方案》《那曲跋绒寺保护维修设计方案》《山南拉加里王宫保护维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日喀则江孜宗山遗址保护维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山南朗赛林庄园保护维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日喀则吉隆帕巴寺维修工程方案设计》《西藏日喀则地区拉孜县平措林寺杜康大殿勘察修缮设计报告》《噶丹寺陈列室设计方案》《西藏康马县朗东庄园勘察报告及修缮设计方案》《日喀则南木林县达那寺保护维修方案》《拉萨市甘丹寺斯东康仓库保护维修方案》《江孜县色康扎仓保护维修方案》《重孜寺重孜佛塔保护维修方案》《热龙寺姆迪拉康保护维修方案》。

此外，西藏自治区文研所配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完成阿里古格王国遗址、科迦寺、江孜白居寺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实地勘察、测绘任务，完成《西藏白居寺勘察报告及修缮设计方案》等。

四、其他工作

科技保护工作是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工作职能之一，先后参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主持的布达拉宫西印经院壁画保护工作；扎什伦布寺壁画保护维修工程病害前期调查工作。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还配合西藏自治区文物局鉴定组参与赴日喀则地区吉隆、定日县等地散落乡村文物的实地考察、统计、鉴定、定级、登记建档工作，并对文物的保护管理问题形成建设性意见。

为推动事业的健康发展构建更加广阔的合作交流平台，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立足事业实际和发展需要，先后同陕西和四川两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达成共识并签署《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意向书》；经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同意，与敦煌研究院达成《合作建设“国家古代壁画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西藏工作站”》的协议；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研究中心、古建研究室、工程管理处及首都师范大学藏学研究中心等单位形成合作意向，从资金、设备援助，人才培养，共同开展课题研究等方面进行合作。

与此同时，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还邀请了著名的藏学研究专家、考古学家巴

桑旺堆、张建林、熊文彬、谢继胜等20余人次进行指导、学术讲座;并选派年轻同志前往内地学习,为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事业科学健康发展注入新鲜活力,为促进文物保护研究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提高自身科研水平和保护技术能力,为西藏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服务是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的工作重心,因此,建所伊始科研工作就取得一定的效果,现在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已经完成各类论文、报告、规划、方案60篇(本)。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先后派员参加了“文化遗产与文化线路保护”无锡论坛,“第四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研讨会”“国家文物局年度考古工作汇报会”“文化遗产保护普洱论坛——茶马古道遗产保护”“青藏高原史前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交流与互动——民族考古与文物学术研讨会”等学术会议,发表了近20篇高质量的论文,并获得好评。

这本论文集所收文章就是从上述已经完成的工作中遴选出来的部分成果,涉及考古调查与发掘、古建筑保护设计方案、壁画保护、考古学研究、史料研究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前期遗存至清末民初的清朝亚东海关遗址。其中部分文章已在其他刊物发表,此次结集时也一并收入。

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有《古水水电站西藏境内淹没区考古调查简报》《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芒康县盐井盐田调查报告》《西藏北部羌塘高原发现的古代文明遗存》《西藏林芝地区林芝村古墓葬调查简报》《清朝亚东海关遗址发掘及相关遗存调查报告》等5篇。其中,《古水水电站西藏境内淹没区考古调查简报》《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芒康县盐井盐田调查报告》两篇报告对2006年澜沧江古水水电站文物调查的成果进行了全面介绍。《西藏北部羌塘高原发现的古代文明遗存》一文则对2002年“藏北高原无人区综合科学考察团”的文物考古收获进行了介绍。《西藏考古60年》为综合介绍西藏考古工作的文章。《从藏东石棺墓材料看西藏东部与川西、滇西北地区文化通道》《西藏芒康县境内“盐井至帮达段”——滇藏、川藏古道文化遗产简述》《西藏吉隆古代文化线路考》《汉文史料所见川滇藏古道西藏境内路线考——附〈西藏程站考〉校释》等几篇文章结合考古资料、历史文献对西藏境内的古代交通线路及文化交流进行了初步梳理,为即将进行的“茶马古道”文化遗产调查做好了理论准备。《佛之“意所依”之多样性时代——10~15世纪西藏古塔常见形制》《佩古措湖边沉寂数百年的两座寺院——恰芒波拉康与喇普德庆寺的最新考古调查》两篇文章侧重于宗教建筑、宗教艺术方面的研究。古建筑勘察及维修设计方案有《西藏自治区江孜县白居寺勘察报告及修缮设计方案》等4篇。

从纵向来看,西藏和平解放60年来,西藏文化遗产继承、保护、研究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建设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党中央、国务院亲切关怀的结果,是国家文物局和相关部委大力支持的结果,是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内地各兄弟单位无

私援助的结果，是西藏自治区各委、办、厅、局积极扶持帮助的结果，是全区几代文物考古工作者不懈努力奋斗的结果。从横向来看，西藏的文物考古工作仍然属于起步晚、基础差、底子薄、人才少、水平低的阶段，需要大家付出更多的心血才能提高前进。

《西藏文物考古研究》第1辑的出版是对年轻的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近年来业务工作的一个小结，从中不难看出他们历经艰辛的野外工作及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其中的一些观点或许有阐述不尽完善、论证不够充分，甚至有较多不足之处，尚祈方家一一批评指正。我们当以此为鞭策，并希望与各界同仁共同努力，为西藏的文物考古事业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桑 布（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局长）

哈比布（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

目 录

西藏考古60年(1951~2011年)	杨 曦(1)
古水水电站西藏境内淹没区考古调查简报	哈比布(17)
西藏北部羌塘高原发现的古代文明遗存	夏格旺堆 达瓦次仁(28)
西藏林芝地区林芝村古墓葬调查简报	夏格旺堆 李林辉(38)
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芒康县盐井盐田调查报告	
.....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43)	
昌都地区芒康县两处新发现吐蕃佛教石刻造像考古调查简报	
.....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70)	
西藏工布江达县洛哇傍卡摩崖造像2009年调查简报	罗布扎西 李林辉(88)
佩古措湖边沉寂数百年的两座寺院——恰芒波拉康与喇普德庆寺的最新 考古调查	夏格旺堆(98)
佛之“意所依”之多样性时代——10~15世纪西藏古塔的常见形制	
..... 夏格旺堆(118)	
清朝亚东海关遗址发掘及相关遗存调查报告	
.....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137)	
西藏吉隆古代文化线路考	李林辉(185)
汉文史料所见川滇藏古道西藏境内路线考——附《西藏程站考》校释	
..... 陈祖军(192)	
从藏东石棺墓材料看西藏东部与川西、滇西北地区的文化通道	杨 曦(221)
西藏芒康县境内“盐井至帮达段”——滇藏、川藏古道文化遗产简述	
..... 夏格旺堆(231)	
从华贡山摩崖题刻谈中国中央政府对察隅地区的开发与治理	陈祖军(251)
西藏江孜县帕拉庄园勘察报告及修缮设计方案	格桑央金 贺 森(261)
西藏日喀则地区拉孜县平措林寺杜康大殿勘察修缮设计报告	格桑央金(294)
西藏自治区江孜县白居寺勘察报告及修缮设计方案	张纪平(319)
西藏康马县朗东庄园勘察报告及修缮设计方案	
..... 格桑央金 德吉央拉 罗布扎西 袁毓杰(356)	

西藏考古60年（1951～2011年）

杨 曦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正式签字生效，西藏和平解放。60年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在几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艰苦奋斗下，西藏考古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持续发展。特别是迈入21世纪以来，伴随西藏自治区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西藏的考古事业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已经发现从旧石器时代至近现代时期的各类文物点4277处，取得比较丰硕的成果。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开展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当时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那曲、定日、林芝、墨脱等地发现一批可能属于石器时代的考古遗物、遗存，此举致使西藏考古学正式登上中国考古的历史大舞台。1961年2月，西藏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拉萨澎波农场东北的坡麓地带，发现并清理了8座古墓葬^[1]，从此揭开西藏科学考古发掘工作的序幕。卡若文化、曲贡文化的相继发现，将西藏的农耕文化推进到距今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广布于西藏各地且文化内涵各异的早期文化遗存为研究吐蕃王朝建立前的西藏古代原始文化提供了可资探索的珍贵资料，随着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建立起西藏考古学文化谱系将成为可能。这些资料的发现“不但对研究西藏高原的社会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对特殊地理环境中形成的人类文明及其人地关系等具有世界性学术研究价值的重大课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2]。

一、旧石器时代考古

西藏境内获得的旧石器时代考古资料全部是地面采集的石器标本，既无明确的地层关系，也未发现古人类化石或伴生动物化石标本。截至目前，报道的石器地点有8处，分别为藏南定日县的苏热地点^[3]、吉隆县的哈东淌地点和却得淌地点^[4]，藏北申扎县的珠洛勒地点^[5]和多格则地点^[6]、班戈县色林错东南岸的各听地点^[7]，藏西日土县的扎布地点^[8]和夏达错东北岸地点^[9]。一些研究者通过分析采集点所处环境的地质地貌特征及与中国华北旧石器标本进行类型学比较后，认为这些石制品的年代至少应在距今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由于这两种断代方法均属间接断代法，用于分析的

石制品是否可早至旧石器时代晚期也存在疑问。但这些标本的获得, 毕竟为西藏旧石器时代考古提供了可能的重要线索。

二、新石器时代考古

目前报道的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在全区内分布相当广泛, 迄今为止已发现约150处, 其中大部分是石器采集地点, 少量为聚落遗址, 经过正式发掘和试掘的遗址数量更少。其中最为重要的发现当为卡若文化与曲贡文化的发掘与认定, 将西藏的农耕文化确定在至少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但是, 到目前为止, 不仅卡若文化与曲贡文化的分布范围、分期与源流还很不清晰, 且它们与西藏境内其他原始文化的关系也完全不清楚, 西藏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更是无从谈起。

一些研究者将发现于藏西北(即藏族传统地理划分中的“羌塘”和“堆”)以细石器及小型石片工具为主要特征的石器采集点认作西藏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的文化遗存。这类遗存主要分布于那曲和阿里地区, 自1956年在那曲首次发现后, 迄今已达100余处, 但无一处经过正式发掘。一些研究者通过与华北及华南地区发现的石器标本进行形态学及加工方法的比对, 认为其时代在距今10000~3000年, 经济类型以狩猎经济为主^[10]。也有人提出以“藏西北文化类型”对其进行归纳^[11]。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遗存发现较多, 其中经过正式发掘或试掘的有昌都县卡若遗址^[12]、小恩达遗址^[13]、拉萨市曲贡遗址^[14]、当雄县加日塘遗址^[15]、贡嘎县昌果沟遗址^[16]、琼结县邦嘎遗址^[17]等。此外, 还发现有察雅县江钦遗址^[18]、林芝县云星遗址、红光遗址、居木遗址、加拉马遗址^[19]、堆龙德庆县达龙查遗址^[20]、嘎冲遗址^[21]、昌东遗址^[22], 以及墨脱县境内的7处石器采集点^[23]。

1. 卡若文化遗址

位于昌都县卡若镇卡若村东约1千米, 澜沧江上游右岸支流卡若曲旁二级台地上, 海拔3100米, 面积约10000平方米。卡若遗址于1977年发现, 1978年5月22日至8月23日,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对卡若遗址进行第一次发掘, 揭露面积230平方米^[24]。1979年5月5日至8月30日,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对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 揭露面积1570平方米^[25]。2002年为制订卡若遗址总体保护规划, 对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 发掘面积150平方米。

根据遗址地层关系和遗存特征, 卡若文化可分为早、晚二期。遗迹有房屋、灰坑、道路、石墙及石砌圆台等, 房屋平面形状有圆形、方形和长方形, 早期房屋的墙体均为草拌泥, 晚期墙体以石砌筑; 建筑形式主要有圜底式、半地穴式和地面筑造三种类型。出土遗物有石、陶、骨、牙器。石质生产工具以打制石器为大宗, 磨制石器较少。打制石器多为石片石器, 一般采用锤击法进行二次加工, 亦有少量使用交互打击法和相

邻两边或相对两边的错向加工,石器种类有铲、斧、锄、切割器、刮削器等。遗址中发现了为数较多的细石器,主要是以间接打击法产生的。磨制石器制作精细,以凹背直刃的鸟翼形石刀、刃开在弓背部的半月形石刀最具代表性。陶器均是夹砂陶,以灰陶和红陶为主,另有少量彩陶,主要器形为罐、盆、碗。器表装饰纹饰繁缛,装饰手法多刻划、压印,纹样多见绳纹、篮纹、附加堆纹、平行线纹、菱形纹等。遗址中还出土种类较多的装饰品,以及大量炭化粟米与动物骨骼,但不见与捕鱼有关的工具及鱼骨。从经济形态上看,卡若文化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兼营狩猎和饲养业,采集经济比重最小,同时还从事石器、骨(角)器和陶器制作,纺织等生产活动。

卡若文化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及川西南、滇北地区的一些原始文化在文化内涵上有相似性,可能是因其有着共同的渊源,或者是互相影响的结果。其时代大致为距今5300~4000年。

2. 小恩达遗址

位于昌都县北5千米的昂曲河东岸的一、二级台地上,海拔3140米,遗址面积约8000平方米。1980年5月,当地群众在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时发现石棺墓、瓮棺墓、陶器、石器、骨器等遗迹和遗物。1986年8月23日至9月7日,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普查队对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调查和试掘,发掘面积60平方米。发现较完整的房屋遗迹3座、灰坑1个、窖穴5个、石棺墓1座,出土大量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骨器、陶片等。早期房屋遗迹为浅地穴式,平面形状为近长方形或方形,居住面经简单加工,有木骨泥墙,其中F3内发现19个竖直柱洞,屋内中央发现有烧灶。窖穴分桶状与袋状两种,平面形状呈圆形或椭圆形。石棺墓墓穴四壁用天然砾石叠砌而成,顶部搁置棚木,上覆砾石而成。葬式为侧身屈肢葬,随葬单耳罐1件。出土的打制石器有铲状器、切割器、石斧、锄状器、尖状器、砍斫器、敲砸器、刮削器、雕刻器、石钻、石矛、石砧、石杵、重石,以及少量细石器(有石核、尖状器、雕刻器、刮削器等)。磨制石器有石镞、穿孔石刀、半月形石刀。骨器有骨针、骨锥、骨刀梗、骨匕。陶器均为夹砂陶,以灰陶为主,褐陶、磨光黑皮陶、红褐陶次之。纹饰以刻划纹为主,有三角纹、平行直线纹、交叉直线纹、波折纹、弦纹,以及附加堆纹、锯齿纹、指甲纹、剔刺纹、压印纹、绳纹等。器形有罐、盆、碗等。对F2采集的炭灰标本测定的碳素年代为距今3775年 $\pm$ 80年(数轮校正为距今4125年 $\pm$ 100年)^[26]。

3. 曲贡遗址早期文化遗存

曲贡遗址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娘热乡曲贡村,东距色拉寺约300米。地处拉萨河谷北缘、色拉乌孜山山脚的洪积砂土层上,海拔3675~3685米。遗址面积约1万平方米,其西北约300米的石室墓基地面积约6500平方米。1984年11月西藏自治区文管

会文物普查队对曲贡遗址进行第一次试掘,试掘面积23.4平方米,发现窖穴1座、灰坑2座,出土大量打制石器、石片、陶片和少量骨器、磨制石器,发掘者提出了“曲贡文化”的命名^[27]。1990年8月至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与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组成的发掘队对该遗址进行首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面积2337.5平方米^[28]。1991年8月进行的第二次发掘揭露面积75平方米^[29]。1992年6月至7月进行的第三次发掘揭露面积775平方米。历次试掘、发掘总面积为3210.9平方米,发现的遗迹有灰坑22个(早期)、墓葬32座(早期3座)、祭祀遗迹2处(晚期)、祭祀石台6座(晚期)^[30]。

以曲贡遗址早期遗存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主要分布于雅鲁藏布江中游支流拉萨河流域的西藏中部地区,其年代大致为距今3500~4000年。曲贡文化大量使用的是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很少。打制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器形种类较多,以砍砸器、凿形器、切割器、斜刃刻刀、尖琢器、石坠等最具特色。石器的涂红现象非常普遍,所涂的红颜色,化验证实为赤铁矿。细石器只见非典型石核和石叶,没有发现第二步加工的工具。磨制石器器类以磨盘、磨棒、研色盘、研色棒为主。曲贡文化的陶器代表了西藏新石器时代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已熟练掌握慢轮修整技术。陶质有夹砂和泥质两种,以黑色和黑褐色为主。器表多经磨光,尤以磨光黑陶最为精美,装饰手法采用了磨光、剔刺、刻划等工艺。器表装饰多在腹部或肩部构成一条不太宽的纹样带,常见有重菱纹、菱格纹、三角折线纹、戳点纹、圆圈纹、网纹、附加堆纹等。陶器种类较多,以罐为主,另有碗、豆、孟、杯、钵、盘等,都为圜底器和圈足器,绝不见平底器,器耳较发达。在遗址的早期文化层中,发现一件扁叶形青铜箭镞一枚,器形规整,刃缘锋利。经检测为标准的锡青铜组织,成型采用的是铸造方法。

早期的3座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墓圻内一般用长方形石块堆垒成石壁,有2座墓葬的基底紧密而平整,经过人工处理。葬式有仰身屈肢葬、二次合葬两种,随葬品数量不多,仅M111随葬4件陶器。

4. 加日塘遗址

位于当雄县羊八井镇桑萨乡切隆多村西南约200米的加日塘,海拔4234米,于2003年青藏铁路西藏段考古调查中发现,从2003年6月至2004年4月先后进行三次发掘,共揭露面积2902平方米,采集和出土近2800件遗物,其中石制品占绝大多数,陶片及其他遗物较少;发现并清理火塘遗迹、灰坑遗迹各1处。加日塘遗址石制品绝大多数为细石器,细石核剥离痕迹清晰有序、形制规整,表现出精良成熟的技术传统;细石叶形制规整,个体小巧;生产工具基本以小石片或细石叶为毛坯打制修理而成,器类有刮削器、尖状器、锯齿器等。磨制石器数量很少,只见穿孔石球、凹窝石球、石磨盘、圆形磨石四类,共计10件。遗址出土的陶片少且碎,可辨器形主要为罐,陶系以夹砂黑陶及夹砂

灰褐陶为主，均为手制。陶器纹饰丰富，呈多种纹样的组合，装饰部位相对固定，其口沿和肩部往往施细绳纹、刻划纹、戳印纹、附加堆纹等组合的装饰纹饰，不少器物口沿的唇部饰有细绳纹，呈花边口沿状，少数素面陶片外表有磨光黑皮或红色陶衣。陶器的这些特征与迄今所知西藏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均有不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可称为“加日塘文化”，它很可能代表藏北与西藏腹心地区接壤地带的一种晚期新石器文化类型，属较高海拔区的游牧部落的季节性遗址，¹⁴C测年数据为距今3200~2900年^[31]。

5. 邦嘎遗址

位于山南地区琼结县下水乡邦嘎村东北。20世纪80年代由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普查队发现，并对该遗址进行小面积试掘^[32]。2000年9月至2002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博物馆、山南地区文物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邦嘎遗址先后进行三次考古发掘。通过发掘，可确认遗址现存分布面积为3000平方米。遗迹现象主要有房屋、灶塘（火塘）、灰坑、墓葬等。发现的一座方形半地穴式房屋开口于早期地层第4层下，平面为圆角近方形，边长6米，沿坑壁四周由石块砌成墙壁，残墙高0.2~0.6米。房屋内发现有5个直径0.6米，深0.4~0.7米的圆形坑洞，推测发掘者可能与窖藏有关。屋内中部偏北处另发现有大小不一的灰坑9个，均直接打破生土层。此外，在遗址下层文化还发现以石板砌边石框及框内用三块石头支架的灶塘（火塘）遗迹1处和十几个灰坑，以及晚期小型石板墓1座。出土遗物有石器（以石磨盘和磨棒为主）、陶器、少量骨器和各种动物遗骸。陶器以夹砂类灰陶、灰褐陶为主，遗址上层则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可辨器形以罐为主，另有钵、盆等，均为圜底。有一定数量的带耳器，器表装饰以刻划纹、几何纹为主，个别有戳印纹及穿孔；另发现有1件陶塑（羊？）、1件磨边陶饼残片。共出土石器186件，有打制、磨制两种，以磨盘、磨石为主，另有敲砸器、砍砸器、砍斫器等。部分石器有涂朱现象。邦嘎遗址中的房屋为首次发现的西藏中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房址，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33]。

6. 昌果沟遗址

1991年9月至10月，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普查队在雅鲁藏布江中游的贡嘎县昌果乡昌果沟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定名为昌果沟遗址^[34]。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西藏队与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对昌果沟遗址进行正式发掘，材料至今未公布。1996年，山南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对昌果沟遗址进行再次发掘，经对出土的青稞和粟的碳化粒进行的碳素年代测定，确认其在距今3500年左右。

遗址出土有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陶器等。石器中打制石器占绝大多数，主要有砍砸器、切割器、刮削器。另有少量细石器，有石核、石叶、刮削器、尖状器等。磨制石器有玉斧、磨盘、研杵、穿孔石球。陶器皆为残片，以夹砂陶为大宗，泥质陶次之，